

我走过的道路

茅盾



(下)

# 我走过的道路

(下)

茅 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我走过的道路（下）

Wo Zouguo de Daolu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顺义冠中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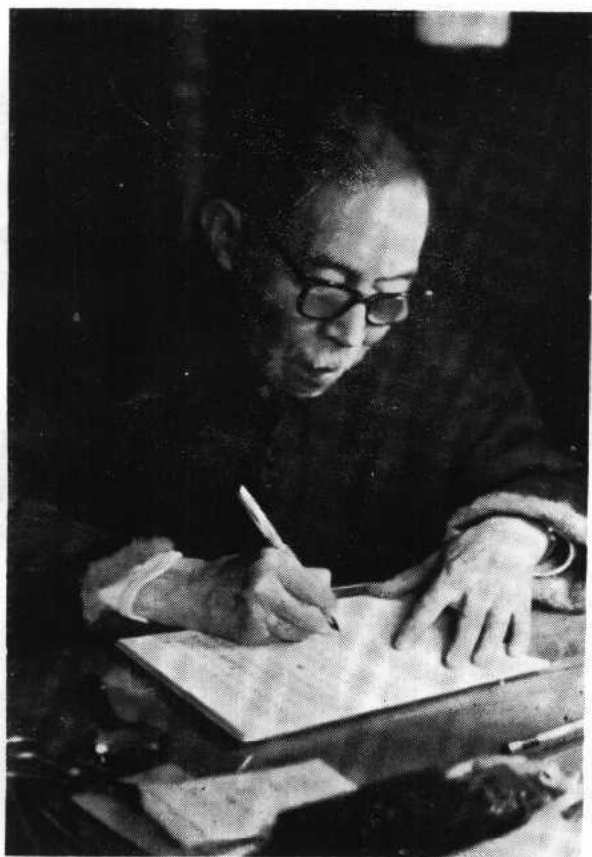
字数321,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4 $\frac{1}{2}$  插页3

198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440

---

ISBN 7-02-000218-X/I·249 定价 3.60 元



作者像

## 序

人到了老年，自知来日无多，回忆过去，凡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一时都必出烂影片，呈现脑海，此时百感交集，又百无聊赖，于是便有把有生以来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者写出来的意念。

但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之非，我今年十足年龄八十四，为果十步而知人事，则七十四年中所作所为，实多愧疚。幼年蒙承慈训，谨言慎行。青年时甫出学校，即进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四年内主编呈改革十说月报，可谓一帆风顺。我是有多方面的嗜好的，在学术上

作者手迹

# 目 次

下 册

烽火连天的日子 .....	1
在香港编《文艺阵地》 .....	41
从东南海滨到西北高原 .....	78
新疆风雨(上) .....	109
新疆风雨(下) .....	151
延安行 .....	190
在抗战逆流中 .....	229
战斗的一九四一年 .....	255
桂林春秋 .....	289
雾重庆的生活 .....	324
走在民主运动的行列中 .....	353
抗战胜利后的奔波 .....	336
访问苏联·迎接新中国 .....	425

## 烽火连天的日子

现在人们都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作为抗日战争爆发的纪念日，然而在当年，在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人们并不意识到这已经是神圣的抗日战争的开始；多数人只把它当作是“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一连串侵华“事件”的又一起事件，以及蒋介石政府妥协投降政策的又一次表演。大家看得清楚，虽然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收复丰台、廊坊的消息，但在辽阔的华北大地上与日军交战的，只有原西北军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仍恪守着“何梅协定”，驻在黄河南岸，未敢越雷池一步。有识之士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七月中旬在庐山的谈判上，企望共产党能说服蒋介石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改弦更张，实现他在“西安事变”中许下的承诺。

至于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将士们，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他们同仇敌忾，就等一声令下，奔赴疆场。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沦陷了！日军从山海关外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增兵！然而，和谈之门仍未关闭。

人们真切地感到了大时代终于来临，是在“八一三”上海战争前夕。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光荣的一周年》，追记了这一难忘的时刻。

“八月七日，川越大使到了上海，同时自长江上游撤下的敌人海军军舰与陆战队亦已集中在上海；八月九日就发生了敌海军武官及

士兵强闯入我虹桥飞机场，枪击卫兵，经我还击毙命的事件。

“九日以后，敌人一面玩外交途径解决的烟幕，一面急速向上海增兵，吴淞口外敌舰相望……十一，十二，京沪沪杭两线我大军向上海推进，尤以十二一天，紧张万状，两线仅各开客车一班。到这时候，上海市民知道大时代确实已经降临。

“十三上午，两租界急遽布防，商团、水兵、陆军，都在华租交界处布了岗位。九时许，敌我哨兵在闸北开火消息传来，同时各银行亦布告奉财政部命令停业二日，一时号外纷飞，人心至为激昂。正午，行驶租界的公共汽车和电车都已贴满了战事业已爆发及我军决心与‘打击者以打击’的报告；尤其是政府封锁长江及南黄浦的消息，与人以莫大的振奋。

“十三整天，上海人心是紧张的，但决非惊惶。上海市民众以坚决的态度面对那即将来临的炮火，准备参加保卫大上海的神圣工作。……

“十四那天，我空军的雄姿出现于黄浦江上，轰击出云舰；我陆军冒死直攻敌军司令部，市民万声欢动，知道我军已取了光荣神武的攻势；‘这回不同“一二八”了，日本小鬼退到那里，我们追到那里！’——这是市民们一致的呼声。杨树浦和虹口这十几个火头，黑烟蔽了半边天，这里有敌人的辐重和财产，但更多的自然是我们同胞血汗的经营，然而漫天的火焰与黑烟所引起的不是恐惧不是顾惜，而是悲壮愉快的心情，‘与敌人同归于尽！’

“十四以后，文化界的群众工作方始由过去‘不合法’的地位而争得了合法的地位；无数的训练班，教育班，次第举办；全市的八十多家播音台接受了歌咏团的救亡歌唱节目；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半开的门，终于亦被慰劳队强挤了进去。但还有不少人喊‘救国无门！’”

上海的进步文艺界，正是在“八一三”之后才真正地、大张旗鼓地、正气凛然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



从八月十日起，闸北、虹口、杨树浦难民的洪流开始向租界滚滚而来。到十二日，德沚不知从哪里听来了谣言，说仗一打起来，日本鬼子就要进驻越界筑路地段，已有不少住在这一地段的居民往租界里搬家了。我们住的信义村正在越界筑路地段，德沚就问我：我们搬不搬？我笑笑道：日本人现在正要笼络英法，不会做出这种刺激英法的蠢事的。倒是我们寄放在开明书店总厂里的那批书要想法搬出来，那是在虹口区，仗打起来是必无幸免的。德沚自报奋勇道：我去找车子运出来，一两千本书，大木箱五六只也就够了。你去办你的事。于是我们分头去忙各人的事。

我是去找冯雪峰，然后一起去参加由邹韬奋、胡愈之他们约集的一个会议。韬奋因“七君子”救国案被捕，前不久才出狱。会上大家都很兴奋，认为神圣的抗日战争是必定要爆发了，亲日派再也拖不住这历史车轮了。大家认为当前的救亡工作是百废待举，这不能靠国民党的官办衙门，必须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自己来干。文化宣传工作也是一样。而这一切又必须首先从政府那里争得公开合法的地位。大家认为国民党政府这种一面不关闭和谈大门，一面妄图包办救亡运动的“国策”是迟早要破产的。谈到出版刊物，有人主张加强目前的几个大型刊物，如《文学》、《中流》、《译文》等。胡愈之说，只要上海战争一起，这些刊物恐怕都要停办，“一二八”时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们要预先想好应急的代替办法。韬奋说，这种大型刊物恐怕适应不了目前这非常时期，需要另外办一些能及时反映这沸腾时代的小型报刊，如日报、周刊、三日刊等。我打算把《生活星期刊》换个名称重新复刊。大家认为这个意见正确，决定分头去酝酿准备，并认为既要有文艺性的刊物，更要有综合性的期刊和报纸。

我马不停蹄地奔波了一天，傍晚回到家中，却不见新搬来的书箱，问德沚才知道是租不到车子也弄不到木箱。“黄包车要价高得吓煞人，塌车根本没有，两三天前就包光了，就是有，也没有木箱。”德沚解释道。但后来她又承认，她到底叫了一辆黄包车，把两皮箱“细软”运到了租界的亲戚家中。

“八一三”上午九时许，传来了闸北已经开火的消息。我跑上街头，过了苏州河（桥的南端，租界高团已垒起了沙包，派了卫兵，但桥上仍能通行），向开明书店总厂的方向走去。我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把那些书运出来，搬出一部分来也好；而更重要的是想亲自证实一下：这大时代是否真的来到了。但是走到海宁路就被拦住了，只有持特别通行证的卡车还能继续往前去，它们多半是去搬运工厂拆卸下来的机器和原材料的。海宁路口挤满了人，不少是象我这样的想进去抢救东西的，但更多的是看热闹的人。大家伸长着脖子望着远处升起的几股浓烟，议论着是什么库房着了火；当骤然听到虹口公园方向传来了一串机关枪声时，人群就哄动起来，欢呼，鼓掌，就象逢到了大大的吉庆喜事。

晚上，郑振铎来，告诉我从市政府得来的可靠消息：政府决定对民间的抗日救亡活动采取开放政策，各种救亡团体，只要向政府登记，就可以公开活动。他又告诉我，《文学》要停刊了。

十四日是星期六，照例有个聚餐会。也许预感到这将是象征和平时期的最后一次聚餐，大家不约而同地都赶来了，人数超出预计的，只得临时增加一桌。多数人已经听说政府改变了禁止救亡运动的政策，于是谈话自然而然集中到今后作家艺术家的任务以及如何活动等问题上来。我的意见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人人都要有拿起枪来的决心，但是在目前，我们不要求作家

艺术家投笔从戎，在抗日战争中，文艺战线也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我们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我们要用它来描绘抗日战士的英姿，用它来喊出四万万同胞保卫国土的决心，也用它来揭露汉奸、亲日派的丑恶嘴脸。但我们的工作岗位将不再在亭子间，而是前线、慰劳队、流动剧团、工厂等等。总之，我们要趁这大时代的洪流，把文艺工作深入到大众中去，提高大众的抗战觉悟，开创出一个抗战文艺的新局面来。谈到出版刊物，多数人主张不管《文学》、《中流》等大型刊物停不停刊，我们都要马上办起一个适应战时需要，能迅速传布出作家们呐喊声的小型刊物来，而且认为应该由我来担任刊物的主编。

战友们的信任和期待，使我义不容辞，当天下午我约了冯雪峰去找巴金。巴金完全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他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决定《文丛》停刊，听说上海杂志公司的《中流》、《译文》也已决定停刊，现在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抗战开始了，但文艺阵地上却反而出现一片空白！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出现，否则我们这些人一定会被后人唾骂的！不过当前书店都忙着搬家，清点物资，收缩业务，顾不上出版新书和新刊物，所以新刊物只有我们自己集资来办。好在一份小型周刊所费不多，出版了第一期，销路估计一定会好，这就可以接着出下去。雪峰道：这是个好办法，何不就用《文学》《中流》《文丛》《译文》这四个刊物同人的名义办起来，资金也由这四个刊物的同人自筹？我说：就这么办，还可以加一条：写稿尽义务，不付稿酬。我们又研究了刊物的名称，初步确定叫《呐喊》，发刊词由我来写。又议定分头去找四个刊物的主编——王统照、黎烈文、靳以、黄源，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天晚上我就到隔壁二号黎烈文家中谈了这件事。第二天

我又在文学社找到了王统照。剑三正在清点《文学》的存稿，准备移交给傅东华。原来傅东华听说《文学》要停刊，对生活书店大为不满，决定自己来续办《文学》，要王统照把存稿转给他。王统照和黎烈文都赞成由四个杂志社的同人集资出版《呐喊》周报的计划，于是我提议：创刊号上《文学》等四个刊物的主编要各写一篇文章。

离开文学社，我去找郑振铎，在他那里又见到了邹韬奋。他们听说我是来约他们为《呐喊》义务写稿的，就笑道，我们也正要请你写不拿稿费的文章哩！原来韬奋要复刊的杂志已确定叫《抗战》三日刊，他们又在帮忙筹办一张小型日报——《救亡日报》。韬奋对我说，上海的民间救亡团体这两天风起云涌地成立起来了，但是他们的活动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这样，他们很可能走入歧途，自生自灭，或者被官方利用和接管了去。所以我们打算仿照原来的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把各方面的群众救亡团体和爱国力量都吸收进来。这件事要马上办，我们已经把你的名字列在发起人名单上了，想来你是会同意的。《救亡日报》就是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社长是郭沫若，主编请夏衍来担任，你是编委之一。《抗战》三日刊仍由我来主编。这两份东西最迟一个星期就要出版。现在你们文艺界要出《呐喊》，正好三方面配合起来。我说，我们也要争取《呐喊》在一个星期内外创刊。我问韬奋为何《文学》要停刊？因为生活书店主要资产并不在华界。韬奋说：这次战争是长期战争，但上海却不可能久守，生活书店与其陷在上海租界，不如及早向内地搬迁，因此《文学》不得不停刊。在上海战争爆发的第三天，韬奋就有了这样有远见的决策，实在令人钦佩。抗战八年中生活书店在国统区的大发展，以及它为中国进步文化事业作出的非

凡贡献，不都源于韬奋这一英明决策么。

下午，接到巴金的电话：靳以、黄源都赞成我们的方案。他建议明天开一次同人会。第二天，巴金和我约了四位主编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编辑方针，纸张和印刷问题，并最后决定以《呐喊》为刊名。我说，创刊号的文章就由我们这些人包了，稿件最迟十九号交来，文章不要长了，一千字以内。巴金说，他还约了胡风、萧乾写文章，不过言明是没有稿费的。当天晚上，我在隆隆炮声中写了《呐喊》的创刊献词《站上各自的岗位》，我把我在聚餐会上讲过的意见扼要地写在文章中。我还说：“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上各自的岗位罢！向前看！这有炮火，有血，有苦痛，有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但在这炮火，这血，这苦痛，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八月二十五日《呐喊》创刊号出版了，小三十二开薄薄的一本，售价二分，封面上印着“文学社、文季社、中流社、译文社合编”，另有一则我起草的本刊启事。兹录全文如下：“沪战发生，文学、文丛、中流、译文等四刊物暂时不能出版，四社同人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爰集群力，合组此小小刊物。倘蒙各方同仁，惠以文稿及木刻漫画，无任欢迎。但本刊排印纸张等经费皆同人自筹，编辑写稿，咸尽义务。对于外来投稿，除赠本刊外，概不致酬，尚祈亮鉴。呐喊周报同人启。”但是，虽然声明没有稿费，外来投稿仍十分踊跃。《呐喊》第二期上的文章还是创刊号的原班人马义务写的，到了第三期，即《烽火》第一期，就主要登载外来稿了。

《呐喊》为何出了两期就改名《烽火》？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呐喊》封面

大约在八月二十日以后，上海街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好几种救亡新报刊，吸引了广大的读者，人们竞相争购，这就是二十号创刊的《抗战》三日刊，二十四日出版的《救亡日报》，二十五日创刊的《呐喊》周报等。然而到了二十九日《呐喊》第二期出版时，

（按：第二期其实不到一周就出版了，这是

因为二十九日是星期日，在这一天出版更能扩大影响，所以提前三天出版，并在封面上标明：每星期日出版。）却传来了数起报纸被工部局扣留，报童被打的消息，同时被扣被禁的还有《抗战》三日刊、《救亡日报》等。我们奔到公共租界工部局去抗议，他们却拿出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所的一纸公函道：我们是遵照上面开列的名单查禁的。当时我们几个都气得七窍冒烟，原来国民党的允许民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是这样的假货！有人主张立即大张旗鼓地把国民党政府这一鄙劣行径揭露出去，公诸于世；也有人分析这可能是市政府的

某些顽固分子在继续作祟，还是先向上面告状。最后决定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由韬奋、愈之、振铎和我联名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发了一封电报，抗议此种破坏抗战有损政府声誉的作法，要求立即查办此事。电报是八月三十一日发出的，九月三日就从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那里转来了邵力子一日的回电和二日的回信。电报说：“已电询新检所答复，最好办法为速办登记。”回信则附了一份上海新闻检查所覆电的抄件，上面辩解道：这是一个“误会”，他们没有以公文致捕房查禁《抗战》等报刊，他们只是给捕房送去了已登记已送检查的报刊名单，“通知捕房凡经登记及已送检查各报刊嘱其务必保障勿予摧残”，而捕房却查禁了所开名单以外的报刊。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诡辩，而且十分卑鄙！明明是他们要捕房查禁刊物，却又把责任完全推到捕房身上。邵力子当然看出了他们耍的把戏，但在给我们的回信中仍旧只好说：“已得该所覆电，核阅所陈辨理尚无谬误”，并再次要求我们“从速办理登记，关于登记手续本部当特予通融从速也”。邵力子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写这封信的苦衷我们也清楚，我们四个人研究后，决定让一步，遵照邵力子的意思，走个形式，到社会局补办登记手续。

那时，对于《呐喊》这刊名已听到不少不赞成的意见，认为作家们在这大时代仅仅《呐喊》助威是不够的，于是就想换一个刊名，但又考虑到才出两期就改名也不好。现在既然要补办登记手续，我们就决定趁机改换刊名为《烽火》。又考虑到登记后照例要注明刊物的负责人，就在《烽火》第一期封面上加印了“编辑人茅盾，发行人巴金”。后来上海沦陷，《烽火》搬到广州继续出版，又把两个负责人倒换过来，成了“编辑人巴金，发行人茅盾”。其实，从十月份起，我暂时离开上海，《烽火》的实际主编就是巴

金了；搬到广州出版后，我这个发行人更完全是挂名，因为那时我已在香港编《文艺阵地》了。

从“八一三”至九月底，我主要是写短论和杂文，发表在《救亡日报》、《呐喊》（《烽火》）、《抗战》以及九月一日出版的四刊《世界知识》《妇女生活》《中华公论》《国民周刊》《战时联合旬刊》上，其中给《救亡日报》写得最多，平均三天一篇，例如散文《炮火的洗礼》、《不是恐怖手段所能慑服的》、《一支火箭以后》、《首先是干部问题》等等。不过我也写了几篇谈论战时文艺问题的文章，下面就多说几句，因为它们反映了我在战争爆发之初对某些新出现的文艺问题的看法。

八月二十三日我写了短文《关于“投笔从军”》，登在《抗战》三日刊第二号上。这是我对当时一个十分时髦的口号的剖析。文章说：“现在多数的文化工作者都抱有‘投笔从军’的壮志。不错，要‘投笔’呢，说‘投’就可以‘投’，然而要‘从军’且有裨于军事呢，怕不能那样简单了。得有相当时期的准备！因而我又想象：有一天都市里的年青文化人必须分散到内地去，在那里，他们担任起教育民众的工作，又自己加紧受军训，于是在必要的一天到来时，他们这才可以和受过训练的壮丁活跃于茂林丛莽之间，——作了神出鬼没的游击队！我设想我们文化人‘投笔从军’的阶段是如此的！抗战坚决地继续下去，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

八月二十八日的《救亡日报》刊登了我的另一篇文章《对于时事播音的一点意见》。文章认为，上海战争发生以来，播音界的确进入了“战时状态”，救亡歌曲代替了从前的靡靡之音，战事新闻、防空常识代替了化妆品宣传，尤其时事播音更为广大听众所关心。但是这些播音只是死板地宣读报纸，缺乏感人的魅力。文



章说：“我有一次曾经听到有将报纸上一段记载（述士兵的英勇的）用说书的方式在retold,觉得既能通俗,又复热情横溢,比之死板板的逐句讲解,实在好多了。”我们如果能将每天的重要战事新闻也用这种方法,加以演述,使成为感人的故事,我们的宣传效果必将大大增加。文章认为:“此事须得文艺界同人和游艺界同人(特别是说书人)联合起来干。文艺界同人担任把当天重要新闻编成故事式。在不背事实的原则下,加一点想象和渲染,是必要的,而为了使故事生动,加一点‘环境描写’也是必要的。……这样编成了的故事,仍是一个大纲,在播送时尚须多加渲染,这一部分工作便可由游艺界同人运用他们特长的技巧来完成它。”在这篇文章中,我首次触及了抗战中文艺的深入民间和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问题。

在另一篇文章《展开我们的文艺战线》(见九月十三日《救亡日报》)中,我谈到了作家们面临的困难。我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战时文艺,是把陆空军将士们英勇的勋业作为中心题材的。这自然是十二分应该,而且也是十二分必要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作家们在这方面的成就,不能不说是单薄一点。”为什么呢?一是文艺作品到底不同于新闻记事,不能盼望两三天以前的英勇战绩今天就会得到文艺上的表现;二是我们的作家还没有充分的机会去搜集材料;三是大多数作家非常缺乏战地生活经验,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家,自然要提笔踌躇的。这些都是摆在作家面前的实际困难。“但是我们是处在一个不容许我们从容准备好了再来干的年代,我们一方面固然必须随时随地刻苦学习,刻苦教育自己,把自己准备得更充分起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同时工作以应客观的要求。”因此,我在文章中建议展开我们的文艺战线,首先,作家们不要因为战地生活的实感而不敢